

# 红星照耀 上海城

1942-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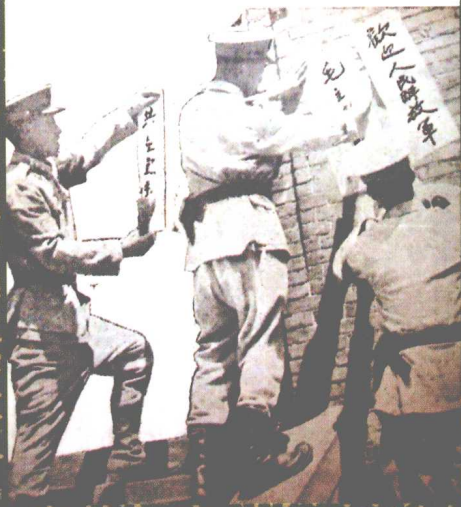
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  
【遗著】

[美]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著

梁禾/译

RED STAR OVER SHANGHAI  
THE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THE  
MUNICIPAL POLICE 1942-1952



人民出版社

上海三部曲

# 红星照耀上海城

——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

| 美 | 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 著

梁禾 © 译

RED STAR OVER SHANGHAI

The 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the Municipal Police  
(1942-1952)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林 敏  
装帧设计:孙 昊  
内文排版:文渊阁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美)魏斐德(Wakeman Jr, F. E.)著;梁禾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

(上海三部曲)

ISBN 978-7-01-009736-7

I. ①红… II. ①魏… ②梁… III. ①警察-组织机构-历史-上海市-  
1942~1952 IV. ①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6367号

## 红星照耀上海城

HONGXING ZHAOYAO SHANGHAICHENG

1942~1952

(美)魏斐德(Wakeman Jr, F. E.)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190千字

ISBN 978-7-01-009736-7 定价:3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熊月之

魏斐德教授的《上海三部曲》，即《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与《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中译本全部出版了，这是上海史学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大事，实在值得庆贺！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1937—2006)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他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师从列文森教授，长期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他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他精通多门外语，兴趣广泛，精力过人，知识极其广博，研究领域相当广阔，成果相当丰硕。在中国历史方面，他研究过明亡清兴，研究过太平天国，也研究过毛泽东。他的后半生，大部分精力

放在上海史研究方面。这三部曲,是他这方面研究的结晶。

三部著作,前后相续,起于1927年,迄于1952年。按中国大陆通行的历史分期,三书研究的历史时段,涵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按照魏斐德自己的历史分期,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革命,建立过三个共和国,即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军阀统治的共和国;第二次是北伐革命,国民党统一了南中国,建立了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共和国;第三次是1949年的革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大陆,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人民共和国。这三部著作,研究的是后两次革命时期。

三部著作,关注的地点,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魏斐德先前关于中国的研究课题,或是以整个中国为对象,或是以某一地区为对象,或是以某一领袖为对象,那么,从1970年代起,他为什么会一改以前的研究取向,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上海历史方面呢?

我以为,这不外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大量新史料的披露,引起了 he 强烈的研究兴趣。1974年以前,他那时还没有来过中国大陆,但已经细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这批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多国势力在上海的政治、军事、情报、经济、文化等领域里盘根错节的史实。这引起了 he 强烈的好奇心。无论对于哪一种史学流派,大量的、未经解读的新鲜史料的发现,总是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1980年代以后多次访问上海,上

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处所藏极其丰富的上海史资料,更坚定了他的研究决心。第二,上海城市历史蕴藏的难以比拟的复杂性,极大地吸引了他的研究兴趣。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多重矛盾的聚焦点:从国际范围看,中英、中日、中法、中美、中苏、日英、日美、英法、美苏等国矛盾,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势力矛盾,在这里都有充分表现;从国内看,中央与地方、地方不同派系、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党右翼与左翼、抗日势力与日伪势力等矛盾,在这里充分展开;从上海地方看,华界与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中国人与外国人、资本家与工人、各地移民群体之间、城市常住人口与临时流动人口、烟赌娼等犯罪行为与社会治安管理,还有诸多城市病,如一市三治、法规多元、人口混杂、住房拥挤……,诸如此类的矛盾纠结在一起,使得上海城市历史研究异常困难。魏斐德是那种不怕有困难、就怕没困难、越是困难越兴奋的学者,是勇于搏风击浪、迎接挑战的学者。上海这座奇特的城市,给了他施展史学独到功夫的良机。所以,他一想到上海城市的异常复杂就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三部著作,叙述重点各有不同。

《上海警察》讲述的是1927至1937年国民党执政的十年。作者以极其丰富的史料向世人展示,现代警察对于现代国家、现代城市十分重要,对于上海这样华洋混处、中西交汇的城市尤为重要,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此相当明白。他们懂得,治理好上海,不光能为全国城市治理树立榜样,而且能为收回租界提供坚强有力的理由,为国民政府在国际上树立起光

辉的形象。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付出大量的心血。但是，国民党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主要在国民党自身。作者认为，国民党以自由、民主、共和自我标榜，却以专制、独裁、暴力的手段对付异己力量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他们有管理城市的美好愿望，却又与黑社会进行勾结，一方面反对毒品走私，一方面又依赖通过毒品走私而获得的不义之财。他们自定法规又自违其法，既是警察，又是罪犯。

《上海歹土》讲述的是1937年至1941年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上海近代史上血雨腥风、最为黑暗的时期。其时，爱国者与汉奸之间，国民党特务与日伪之间，相互暗杀。被暗杀者有部长、市长、军长、青帮大亨、银行专员，暗杀手段有刀砍、枪击、机枪扫、炸弹炸，血肉横飞，恐怖异常。沪西一带尤为激烈，再加上泛滥横溢的烟赌娼和各种犯罪，故被称为“歹土”。要清晰地描述、分析这段历史殊非易事。魏斐德以其如椽大笔，举重若轻，对此进行了精彩的叙述与深入的分析。作者精当地指出，无休无止的恐怖，对于整个社会是极大的毒害，当犯罪性和政治性的谋杀变成了日常新闻，人们的神经就会麻木，心理上就会一蹶不振，所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整个上海城市，上海人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抵抗了。书中相当细致地分析，在爱国旗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并不一定都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怀，失业、爱国、友谊、贫穷都有可能是一个人成为杀手的动机。有些人去投掷炸弹，实施暗杀，其直接目的就是能得到那么一点点钱。

《红星照耀上海城》讲述是1942以后，特别是1945年以后，共产党如何通过在旧政权警察内部进行活动，建立秘密支部，到解放以后，将国民党领导的上海警察机构变成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1949年以后至1952年上海社会管理的历史，包括对城市的接管、控制流氓与轻罪犯、镇压武装罪犯、救济难民与遣送回乡、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扫除黄赌毒。作者认为，在解放后五年内，新政府控制了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难民问题，扫除了上海的不法现象，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是一次革命的胜利。

三部曲最后，作者将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几年取得的成功，与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招致的失败进行对比，提出一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是新政权，为什么会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作者认为，从大的背景看，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警察实施管辖的许多困难，均来自于列强所享有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而共产党干部进入的则是一个完全属于中国人统治的城市；先前是一市多治、互不统辖的支离破碎的城市，到1949年已是完全统一的中国城市。除此之外，共产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努力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对于接管周密谨慎的准备，其中包括对上海社会每一个层面的渗透；行政管理上的速度与充分程度；吸收经过再教育并能积极听取公众批评的现存执法人员；维持公共秩序并迅速摧毁国民党残存武装力量 and 他们的潜伏人员；在居民委员会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安全系统；发动爱国群众运动，反对反革命分子和



间谍。

如果将三部曲综合起来看,可以发现所述时段虽然不一样,重点不一样,但有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以变动时期上海社会管理为研究对象,分析细密化,定性辩证化,注意历史的相关性与连续性。对于国民党警务改革为什么会走向与罪犯同流合污、蒋介石将上海治理得很好的动机为什么会招致很坏的效果,对于孤岛时期上海盛行暗杀的后果,对待一些与汪伪政权合作者的动机,作者都十分注意历史的细节,注意用语的分寸,不轻易下好坏忠奸之类价值判断的断语,引而不发,将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作者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公安局在管辖上海城市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这个机构把国民党警察机构的一些特点,诸如保甲制、社会家长制式、强调公共秩序等,转化为公安局的作用。这是历史的连续性。共产党公安局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扫除罪犯、腐败和社会的混乱现象,关键在于公安局的自我控制和向群众组织开放。城市管理机构起源于国民党时期和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期,但他们没有成功,而共产党成功了,原因在于共产党能够动员人民大众,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历史的相关性。

至于宏阔的视野,翔实的资料,优美的文笔,那是魏斐德所有著作的共性,已有很多评论述及,这里就毋庸赘述了。

魏斐德钟情上海史,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在美国掀起上海史研究旋风,带出上海史研究雄壮团队,闯出上海史研究一片天地。在他的带领或影响下,美国自1980年代起,从西部的伯克利、斯坦福、洛杉矶,到

东部的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都有一批学者从事上海城市史研究。在此之前，仅墨菲、费维恺、刘广京等少数学者从事此项研究，到21世纪之初，已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蔚为壮观，上海史甚焉有显学之说，伯克利学者甚至有“上海帮”之谑称。

魏斐德长期从事上海史研究，与上海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倡导下，以他和他的美国同事为一方，以上海张仲礼先生等人为另一方，共同申请课题经费，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互派访问学者和学生，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史和中国城市史的发展和繁荣。他很早就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每次到上海来，他都尽可能到社科院发表演讲，交流心得。上海社科院需要请他帮忙的地方，他总是有求必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予以满足。

由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自1980年代起，我与魏斐德教授就有很多接触。他大我12岁，正好一轮，蒙他不弃，引为挚友，每次见面，从学问到社会、人生，无所不聊。我每每为他的博识、热情、谦逊与坦诚所感动。他曾介绍过许多学生来找我，我也介绍许多年轻人去找他，凡有所托，必有落实。2002年12月10日，他来历史所，作题为《历史的作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最新趋势》演讲，那是他在历史所的最后一次演讲。那时，他已因手术事故而坐在轮椅上，历史所大楼没有轮椅通道，上下需人抬上抬下，很不方便。我深感不安，但他泰然处之，一脸笑容，全不介意。2006年9月，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他原答应前来参加庆典，不料可恶的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病中表示，不能前来

是他“永远的遗憾”，这令我们极为难过。他去世以后，我本打算去参加他的葬礼，后因签证耽搁而未果，只好寄去唁文。我在唁文中写道：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意思是说，道德之师比学问之师更为难见。魏斐德以天纵之英，过人之才，加上广采博览，用功极勤，成就了他学术上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辉煌成就。他真诚善良，朴实醇厚，待人接物，全无城府，教人助人，一片至诚，他的微笑永远是那么灿烂，他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清澈。这成就了他在学者、学生中的崇高地位。他学足为师，行足为范，用学术和德行树立了经师兼人师的光辉形象。

魏斐德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此前有三本我曾参与其事。三部曲的前两部，《上海歹土》与《上海警察》，作为我主持的《上海史译丛》中的两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3年、2004年先后出版，现在早已售罄。魏斐德曾为《上海歹土》中文版专门写了序言。魏斐德离世以后，他的夫人梁禾将其有关遗文汇集成书，我组织所里同仁将其译为中文，题为《讲述中国历史》，上下两卷，出版后很受欢迎。现在，梁禾又将《红星照耀上海城》译为中文，与先前已出之《上海警察》、《上海歹土》二书，合为《上海三部曲》，这既实现了魏斐德的遗愿，也是对魏斐德最好的纪念。

学者的名字是与学术论著联系在一起的，论著不朽，则学者永存。

2011年1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梁禾

2009年9月初完成编译先生的遗著《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时，先生去世已三周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小段日子，全部用在这部书稿上。那时他刚从伯克莱大学退居到我们在俄勒冈州奥斯维古湖城的家，兴奋地准备投入终于盼来的全日写作生活：他计划写好几本书，其中有与我合作的《潘汉年与中国共产党特工》，有中国官廷贪污舞弊史等，还计划完成修改《红星》书稿。不幸，斐德从伯克莱一路抱病到家，几天后被诊断为晚期癌症，并得知：生命属于他的日子，仅仅数月。

即使如此，斐德镇静自若，“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开车去兜风！”他说得似乎轻松。时值初夏，碧蓝的晴空下，是天边耸立着的终年白雪皑皑的奇姿山峰；明媚的阳光里，满目是盛开的灿烂鲜花，万紫千红。“咳，明年这时我已不在了！”斐德感慨起来，但仍保持平静，双眼因阳光耀眼而微微眯起，脸上依然挂着那惯常的宽厚笑容。我的心开始抽搐，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这以后的日子里，他每天起床后就进入书房工作，静静地修

改这部稿子。随着体衰加重,他的工作时间不得不从每天四五个小时递减到两三个、一个小时左右,他把自己仅剩的最后一点一滴生命完全投入在叙述上海历史之中。

斐德对死亡没有畏惧,因为他有着饱满热忱的一生。他经常说:“热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Pass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直到最后一刻,中国史学依然是他的挚爱,一如既往地激励他驰骋在历史的壮阔中,废寝忘食。热忱点燃着他的生命之灯,刺激他的思考,使他得以超越学院政治的混浊和人际的市侩。热忱,即发自内心的激情,需要真诚,需要不受外界左右、诚实倾听追寻心声的勇气来体现。热忱赋予人生意义,聚焦使生命具有积累。热忱加聚焦,是我对斐德生命的一个见证,这部《上海三部曲》便是一例。

二十年前的一个暑期,我和斐德在坐落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全国人文研究中心初逢,当时斐德正在写“三部曲”首卷《上海警察》;21世纪初端,我们访上海时曾与资深的芮传明教授切磋《上海歹土》的个别译句——芮教授做学问严谨周密,翻译的每个词句都反复仔细掂量推敲;二十年后,他已离去,却由我完成了“三部曲”之三的中文版编译。这部涵盖了上海三十年历史的著作,是斐德在这弹指一挥间的二十年里留下的又一道轨迹。

确切地说,斐德在2005年就完成了《红星照耀上海城》的初稿,而且那时他已经开始与我一起合写潘汉年与中共特工的书。这期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约请他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这让他有点兴奋。但仔细审视了自己的时间和原有的写作计划之后,斐德认为还应

坚持自己原有的写作计划，先要完成自己的上海三部曲。这对在历史流程中航行的他，犹如得以抵达一个预期的港湾，而他与上海史的情结，似乎也可因完成这部著作而得到某种程度的释然。

作为明清史学家，魏斐德何以将视线转向了上海史？这个问题反复被众人提出。他本人曾经这么说：“1974年，我随访华代表团抵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朦朦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已往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一阵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已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最初灵感之一。”晚清的上海，从开埠到成为二三十年代的东方巴黎、多租界状，到太平洋战争期的分割区域，到抗战期的暗杀恐怖中心，以及国共两党对这个城市的长期争夺，更是中国政权建立的序幕。传统与进步，东方与西方，在这个城市碰撞交织更新，这一切磅礴错综的历史现象都深深吸引着它。

斐德长期关注警察问题。自然，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其执政得靠警察力量来保证。1949年5月24日陈毅三野部队的年轻战士们冲垮了“上海长城”——国民党军队用尖利的木桩设立的防卫线，接着迅速接管了上海市警察局，上海城于是全部落入共产党手中。历史证明，共产党对上海市政警察的接管和改造，是巩固政权的关键，这一成功，举世罕见。人们只要看一下半个世纪后美国军队攻克巴格达后因无力掌控警察力量而造成的血腥混乱和城政瘫痪的程度，便不免惊叹中国共产党当年的伟大壮举。

从解放到1950年代的各场政治运动中，警察部队都是国家政权的铁腕工具。在今天上海市重新成为东西方文化经济交融的国际后现代大都市的形势下，警察力量发挥着更巨大的作用，其形式也自然更加高科技化、专业化、高效率。然而，它的基本运作形式，它与基层街道里弄建立的密切合作网等等，仍然源于本套著作展现的模式与范畴。可以说，对上海警察的接管、改造、发展，是世界上一个政权成功得以建立和巩固的典范。

如今，上海已是一个超级国际后现代的巨型都市。全城到处可见的是，高高耸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上的巨幅高清屏幕，它们昼夜不息地打出各种商品广告，以诱人购物的缤纷图像和色彩，展示着物质世界不可抵挡的魅力；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多是来自各地的青壮年民众，整个都市在人气和物欲的汹涌中前行。

然而，人们不禁仍然要问：这上海城市的“本土性”到底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与生俱来的真正文化属性？当那些在本地成长或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不再能在马路上看得到相当数量的上海本城人，也看不到一定量的代表了本地文化的东西，甚至发现连上海话在当地的无比优越也在快速消失时，他们似乎困惑起来。也许，要为这些思考提供答案，人们大概只有回到自己的过去，也许只有在往昔和历史里，才能找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也是斐德写上海三部曲的情结之一吧。

2011年冬末于上海

## 前 言

每一场革命都既是潮流，也是随流；它既是对昨日现实的集中反应，也仅是活下去的一种办法，直到历史再翻过一页，并将我们从必须呼吸昨日的空气里释放出来，而那份空气既带香味又可致命。

奥托·科柴莫：“闭塞的状况和革命性的突破”<sup>①</sup>

此书是我上海警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整个三部曲叙述了上海警察从1927年到1952年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

第一部《上海警察》覆盖了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十年”，叙述了国民政府通过在大都市建立现代化警察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国民革命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被蒋介石政权视为成败的关键。假如国民党能有效地管辖上海，那么它便可以向外国

---

<sup>①</sup> ①Otto Kircheimer, “Confining Con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Break - though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4: 974 (December 1965)。摘自《美国政治学评论》1965年12月。59卷，第4期，第974页。



势力证实：中国应当以取缔治外法权和帝国主义霸权对划分该市的外国租界的控制来恢复自己的主权。然而，这些努力失败了，主要由于三方面原因所致。第一，国民党人如此执迷不悟地打击共产党人，以致他们一再与国际租界内的英方警察当权发生冲突，而没有在主权的问题上集中与他们交涉。第二，出于同一原因，而且为迫使中国金融界头目的合作，蒋介石的警方与上海黑社会进行结盟，从而未能有效地打击罪犯。第三，国民党政府对走私毒品非法收入不断增长的依赖，使国民政府“罪恶化”，最终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并使蒋介石关于他的警察经得起考验的宣称彻底成为笑话。

第二部《上海歹土》以1937年抗战爆发为叙述起点，主要讲述了在这以后的四年中，上海孤岛（法租界和国际租界）的外国警方如何卷入了在“歹土”一带争斗尤为激烈的、在国民党特务与傀儡警察及日方之间的恶战。尽管西方警察企图在这中间保持中立，但他们还是被卷入了以沪西地带为主的、由国民党秘密特务向傀儡警察和日本宪兵发起的血战。中国人一方，汉奸与爱国者们之间开战，双方各自向对方亮出了汤姆逊机枪和手榴弹。在这同时，日本人和朝鲜的黑帮势力（yakuza）则在这个无人管治的城市里，对赌场、妓院和鸦片馆的控制展开了争夺战。由于汪精卫的“蒙特卡洛政权”<sup>①</sup>依赖于上海城各种恶习的

<sup>①</sup> 译者注：Monte Carlo，即摩洛哥的蒙特卡洛，一度为世界上最大赌场所在地。